

马克思主义研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题

意识形态数字: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动力支撑

颜吾珥 黄国雄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融合发展的时代成果,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意识形态数字的赋能支撑,以意识形态数字为契机,探寻二者的内在耦合、实然吁求、全景透视等共建机理,开辟新质生产力的意识形态思想统领新赛道是抢占现代化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意识形态数字也面临理念阻滞、技术掣肘、供需断层等问题困境。因此,为解决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越位困局问题,应做好筑牢基底、提质增效、换轨升级等相关工作,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健全意识形态数字创新体制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关键词】 意识形态数字;新质生产力;创新;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①这深刻道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要不断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不断打通生产过程的堵点难题,形成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进而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汇聚创新力量。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注入了新动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新的科技力量。意识形态数字是指在数字模型建构和算法运行过程中加入意识形态思想理念,使数字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技术。因此,意识形态数字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离不开数据、算力、算法的赋能。体制机制作为上层建筑是保证数字经济基础发展的关键所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②改革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对促进生产关系的转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时代意义。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相关体制机制结合的问题研究,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能够挖掘数字技术的思想内涵,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周文等从与构建新质生产力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等角度出发,指出:“应积极调整现有生产关系,推动形成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与技术突破的体制机制,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③;姚树洁等从意识形态威胁论等视角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指出:“新质生产力对解决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具有重要作用。”^④这

颜吾珥,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原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4);黄国雄,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4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及左翼政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23&ZD328)的阶段成果。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③周文、李雪艳:《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4期。

④姚树洁、张小倩:《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深刻表明,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要不断突破旧有体制机制,为意识形态数字创造全新的体制机制环境,方能在数字赋能的过程中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使数字能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为数字智能化生产指明思想前进方向,更好地解决外界的意识形态威胁问题。简言之,意识形态数字是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的,不仅能够为数字发展提供思想意识形态指引,还能够确保新质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发展做贡献。

一、共建契机:意识形态数字与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机遇审视

意识形态数字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创新、数据要素和意识形态思想相互融合形成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最初展现的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是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是以动态样势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新质生产力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础,在新时代发展中立足实践不断凝练而成的科学力量。意识形态数字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能够进一步实现二者的内在耦合,实现二者在思想、实践上的呼应。

(一) 延异互构:意识形态数字与新质生产力内在耦合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技术是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现代属于信息技术,在超越传统技术的基础上深刻影响着新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而意识形态数字作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数字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使用,二者本质上都属于社会生产力范畴,孕育于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蕴含着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数字标准体系,需要推进意识形态数字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改良与技术迭代,而是在新时代科技背景下,通过创新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而形成的新兴生产力,是新质思维与技术融合的时代产物。既内含传统生产力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属性,又突出科学技术赋能的“新”与“质”的优势。“新”与“质”的结合强调的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跃升的源动力,新质思维的形成成为思想层面的难题困境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为人机融合发展创造了全新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①这深刻表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人类劳动生产过程中,成为人们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决定劳动生产力变化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理念,“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②,促进人的思想转变,改造传统产业,创新工作机制,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劳动生产力”的原创性贡献,进一步丰富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是意识形态数字提升生产效率与生产智能化水平的根本所在。智能时代,意识形态数字以智能化的数据、算法、算力展现新型生产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融入数字生产全过程,使数字能够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获得现实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声。通过智能控制、知识图谱、机器感知等智能化技术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生产出符合市场大众需求的产品,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解决信息更新不及时、信息不连通等问题,实现产品的个性化、精准化推送目标,助力生产方式的变革,形成更加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指出:“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广大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①这深刻表明,智能时代,数字技术的赋能能够优化生产劳动,减轻人类肩负的劳动,使人能够从体力劳动中抽身出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数字能够使用数字技术最大限度地造福大众,不断形成更加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满足人们数字价值需求,简化意识形态宣传内容的繁杂生产过程,促进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在推动人的思想解放进程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人的主观意识的深度融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凝聚精神力量。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机器代替人工,而是人机共融状态的精彩呈现,为新质思维的形成与新兴技术的突破提供舞台。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意识形态数字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促进意识形态数字的合理布局 and 持续创新。从各种网络数据中提取科学有用信息,内嵌智能图景以建立数据与生产目标的连接桥梁,使人能够从海量信息中解放出来。因为,海量数据本身可用价值不高,通过数字挖掘、算法分析之后,数据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深度融合,促进人的思想解放的同时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组合方式,使数据的使用价值得到质的提升。意识形态数字使用价值的提升本质上就是技术创新的体现,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创新驱动不谋而合。这深刻表明,新质生产力与意识形态数字都属于社会生产力范畴,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的能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力量,为人的思想解放赋能新兴力量,在促进人机深度融合过程中,为数字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思维与技术样本。

（二）意涵构筑：新质生产力的意识形态数字实然吁求

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它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具有高效能、高质量、高科技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意识形态数字是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新型生产技术,通过多种视觉、触觉交互技术为用户传播高质量意识形态思想内容,赋能新质生产力新模式的开拓。新质生产力的意识形态数字实然吁求表明,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融入经济思想,强化创新意识,做好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实现数字赋能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目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②这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明确了使命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审时度势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③这深刻表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头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④,务必要做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工作,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要抓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精神力量,方能为各个技术创新突破做好时代准备。意识形态数字作为人工智能的技术集成和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呈现方式,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入新里程碑的标志,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贡献数字力量。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来看,经济体系必须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强调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才能突破旧有经济模式。这深刻表明,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将新质思维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次的发展中,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数字在经济转型中能够起到重要的助力赋能作用,以意识形态数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③《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字为动力支撑的新质生产力,也将在推动质量变革中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意识形态数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在科技激励机制推动下,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为主要手段,扩大内需激发产业发展潜能,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国家产业的结构优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微观层面,意识形态数字能够有效促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提升,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渲染工作统一企业改革思想,打破旧有思维模式,将新质思维融入企业革新发展中,推进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工作。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这深刻表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才是生产的区别所在,这是决定不同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在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数字的赋能能够提高劳动资料的技术含新量、思维含新量,孕育出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的新型劳动工具,进一步解放劳动者的大脑和双手,形成新的智能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创造更多物质的基础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形成新质思维上层建筑,进一步增强人们思想认同、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简言之,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是智能时代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两者的相辅相成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深化人们情感认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赋能。

(三) 动能呈现: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全景透视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②这深刻表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是具有强大推动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跟上科学技术的步伐才能实现二者的互利共赢。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生产力,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意识形态数字的赋能可以进一步把控思想舆论方向,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数智时代,“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③。这深刻表明,生产力的提升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赋能,意识形态数字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支撑,在科学技术赋能下有利于推动数字产业链的优化整合,不断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潜能。其一,意识形态数字融合传统生产力。传统产业对应的是传统生产力,意识形态数字融合传统生产力意味着意识形态数字赋予产业更多新的数字元素、精神内涵、新质思维和文化底气。马克思指出:“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④这深刻表明,人的力量就是生产力,人的主体性地位对传统生产力的影响很大。与传统时代的流水式、大规模生产方式不同,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人的力量作为生产力表明,生产力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唯有建立支持全面创新的人才制度体系,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思维融入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体中,方能孵化出更多个性化、柔性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以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对物质、精神、生态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生产力无法立足经济基础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因此,为摆脱自然环境和传统思维的限制,可以通过读取传感器数据、预测情绪、自动调整系统等智能手段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营造文化创新氛围,实现传统产业的自我完善,形成多样化的优质供给体系,方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其二,意识形态数字革新传统网络技术。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从传统网络技术到新质生产工具的转变,意识形态数字不断改革创新,突破旧有体制机制,摆脱技术困境,为新兴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9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0页。

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这深刻表明,生产工具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智能时代脱离数字生产工具谈高质量发展更是无稽之谈。革新传统网络数字是通过高度集成计算方式实现数据计算的智能化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重塑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②。这深刻表明,意识形态数字的核心是通过生产技术赋能数据,使数据原材料自带意识形态思想意识,构建适应其本身传播发展的机制体系,在加工赋能中通过算法推进主流媒体变革形成新的传播内容,在算力支撑下改变传播方式,使之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其三,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③这深刻表明,要辩证看待资本对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问题,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起引领下对资本进行约束与规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撑力量。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就是生产要素的重组,必须突破传统要素边界,打破原有要素格局,利用资本有利因素重构要素以降低运行成本。意识形态数字的赋能能够催生生产要素重组思维的形成,在意识形态思想指导下转换数字生产思路,进一步促进市场壁垒问题的智能转化。进一步而言,重组生产要素将跨越更多问题障碍,催生新意识形态传播空间,进而推动相应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生产效率,形成新质生产力。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全景透视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融合、传统网络技术的革新、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的动能呈现,意识形态思想的融入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创新体制机制的同时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赋予新的时代动力。

二、越位困局: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引擎症结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稳定起步状态,意识形态数字与新质生产力都以新兴技术为基础支撑,意识形态数字是由众多新兴技术与意识形态思想汇聚而成的,新质生产力则主要以创新驱动为主,因此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优势日益凸显。但是,必须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数字不是简单的数字与技术的合成,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赋予更加难能可贵。目前,意识形态数字还面临着共享理念阻滞、技术掣肘、供需断层等越位挑战难题,尚未满足意识形态数字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技术要求。

(一) 理念湮塞:意识形态数据共享理念滞后

马克思指出:“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④这深刻表明,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所创造的福利是使生产满足人的现实需要的真实表现。意识形态数字的技术发展和现实运用,不仅需要智能数据的兜底,更需要共享数据理念的支撑,方能实现生产目标以满足人的精神、物质需求。核心数据的开发与革新,对算法生产的初筛资料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是决定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动能效果的关键。但是,数据的私密性使得意识形态数字操作者在数据加工过程中为了保护科学技术的核心竞争力而保持沉默,对传统数据的加工提炼倾向于自身的直觉,缺乏共享交流理念,导致数据无法得到实时更新、流通。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1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9页。

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这深刻表明,智能时代,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着社会的一切关系。意识形态数字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支撑,是以大量的共享数据为运行基底的,在对原始数据进行采集、分析、挖掘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提取融合数据使之成为新的数字信息,这是改变社会关系的基础。共享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 ChatGPT 算法模型的构建,高质量数据也成为促进算法云计算、云分析的重要支撑点。但是,高质量数据如果缺乏意识形态思想规制,在旧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束缚下任由开发者融入西方化思想信息,在共享传播中容易产生舆论冲击,给人的思想意识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文化殖民是一种意识形态侵略行径,而数字技术在其中扮演着技术推动作用。”^②这深刻表明,数字技术在助力西方意识形态文化渗透过程中也可能发挥推动作用,如果数据共享理念缺乏科学思想引领,缺乏科技方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支撑,将难以抢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赛道。因此,为做好意识形态思想的输出工作,意识形态数字需要对不同层级的数据进行分析融合加工,革除资本主义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形成以文化宣传为主的数字算法模型,将“和合共生”理念融入其中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为社会关系的改变贡献时代力量。“数字技术浪潮兴起,开发出许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极大地刷新了当代劳动生产资料乃至生产力的面貌。”^③就生产资料而言,数据作为智能时代的生产要素,直接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模式,数据共享也由于涉及敏感、隐私、文化、行业竞争等问题而遭到质疑。对于个人隐私问题,共享数据无法保证数字使用者的网络安全,一旦点击医疗、教育、贷款等相关咨询信息,数据在共享过程中得到反馈之后就可能遭受信息轰炸,使得数字使用者无法安宁。这对意识形态数字使用者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数据共享打着方便客户的幌子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这是法律法规需要进行合理规制的现实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各种类生成技术迭代更新,从 GPT-1 到 ChatGPT,模型规模越来越大,所使用的预训练数据量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智能。由此导致的数据共享问题也层出不穷,各大算法平台拥有大量的数据信息,成为数据共享源。但是核心数据作为竞争的重要抓手是不可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因为核心数据持有者出于对商业利益、知识产权的保护,担心在共享过程中无法获得预期的收益效果,加上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欠发达地区无法有效保护核心技术的安全性,使得核心数据一旦泄露,就会危害意识形态安全。大规模数据共享与核心数据的短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意识形态数字与使用者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意识形态工作只能泛泛而谈,无法对数字使用者形成科学有效的引领。简言之,数据共享要做到科学有效,要立足不同区域经济基础,不断突破核心数据难关,为人们提供科学有效信息,方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人们思想开阔。

(二) 技术掣肘:意识形态算法运行能力不足

新质生产力作为高度发达的新兴生产力,数字技术是赋能生产力创新驱动的核心。数字技术依托算法模型、ChatGPT 运行操作,为智能社会发展提供技术动能。但是,算法的运行能力直接关乎新质生产力的实际效能,如果算法无法立足科学数据作出科学判断,缺乏高质量思想渗透引领,无法执行规制者的决策,运用算法模型区别对待不同生产资料,容易扰乱市场秩序。

意识形态数字与新质生产力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意识形态数字作为新型传播工具,不断赋予数字新的思想意识,使数字在算法运行中能够成为使用者发布各种舆论的智能工具。新质生产力则是以实际工作为运行机制,以高端化运行提高发展效率,为实现既定目标助力。算法运行追求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②刘映芳:《数字精神权力的主要内涵、布展机理与鲜明特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③肖巍:《从马克思主义视野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4期。

构建虚拟世界以算法交互形式与人进行深度交流,但是,在算法运行中“以技术为掩盖进行意识形态数字化侵袭”^①会对人的思想意识造成很大的冲击,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思维的形成。由于处理解读文字能力有限,算法运行在繁杂舆论中未能及时疏通网民情绪,无法科学分辨优秀传统文化与低俗话语的界限,反而将低俗话语通过算法运行推向网民。缺乏相应运行机构的监督,低俗话语蒙混过关掺杂其中,在运行交流中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侵蚀人的主观思想。如何融合新质生产力与意识形态数字工具,使之形成高质量的算法运行模式打破运行障碍是亟需解决的难题。一些商业机构由于管理不到位,导致一些工作者运用算法运行技术发布定制化的高端消极内容信息影响公众的价值思考,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是极其不利的。由于无法掌控算法核心关键技术,算法的运行机制无法得到公开审视,信息用户无法得知被推送内容的原理何在,造成扰民行为,无形中削弱公众对意识形态数字的公信力,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②算法是与先前的劳动生产力有着密切关联的,是劳动生产力在智能时代的彰显。虽看似是冷冰冰的数据叠加,但是仍然属于人的劳动延伸,是人为控制的,因此难免受人的主观能动性影响。新质生产力以提高生产质量为主,算法在运行中如果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缺乏对一些核心关键技术的掌控,没有立足先前已经获取的生产力,运行根基不牢,缺乏高质量理念引领,容易丧失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规训,可能会演变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运行工具,会演变为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难题。算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技术支撑,在经济发展大环境下能够发挥市场优势,以实现经济效应为重要抓手推动社会的前进发展。但是,算法运行在以市场效应为先的理念指使下,会将以资本盈利为主的信息融入数据初筛阶段,使得带有偏见的数据经过算法运行推送之后造成社会舆论偏见事件的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算法运行要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洗礼,将数据收集、运行程序公之于众,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使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让算法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更好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三) 供需断层:意识形态算力供给模式陈旧

算力是对信息进行收集计算过程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数字技术的核心,是影响社会舆论发展的压舱石。算力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加上人们对信息缺乏理性思考,使得算力供需矛盾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也对算力提出了更高的实践要求。因此,唯有创新算力供给模式、发展高质量算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数字发展难题。

进入智能时代,人们使用算法频率加快,算力负荷加重,这对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言是极其不利的。一方面,庞大的网民基数使得算力负重加大,算法需求值不断提升,AI 专项算力、高性能算力等高端算力的缺口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无法形成供给闭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时效性。在数字互联网消费领域,算力支撑着电商平台的商品推荐、物流调度等,数字生产者只关注产量,极大提升用户的网络体验,却忽视市场与消费者实际需求,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产品供求关系失衡。特别是一些体制机制存在的漏洞问题,在部分科研人员的强烈反映下仍然无法及时得到回应,一些不知情网民借机肆无忌惮地使用数字技术发布信息宣泄不满情绪,希望借助数字平台寻求现实的心理安慰。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算力的高负荷运作将导致各种数据、算法瘫痪,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及时填充网络空间,一些制度体系无法及时得到完善,与网民的交流互动存在时间差,无法及时了解

^①张磊、王建新:《化智为治:人工智能驱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路》,《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网民思想需求并作出合理疏导,无形中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另一方面,现有算力供给资源与用户交流没有形成精准匹配状态。算力本身存在着位置分散、能力各异等缺点,公有云空间短期增长有限,精准匹配管理调度难以实现,算力无法保证资源质量的精准供给。“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这深刻表明,意识与现实生活是分不开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用户对于自己喜爱的图片、商品、视频等信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无法从算力供给资源获取个人喜爱之物,使意识与生活的桥梁产生割裂。算力提供的大众化旅游、徒步等信息却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用户视角,两者之间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对话,使得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发生,导致大量算力闲置浪费,无法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高质量算力是以用户具体实际应用为导向的,采用的是先进的计算架构,充分调动各项供给资源,高效能解决算力利用率低下问题,提升各项推送算力资源的利用率。但是,高质量算力对于目前数字发展形势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现实发展中大多数还是以低质量算力为主,影响着数字的平衡发展。具体而言,由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研判不足,供给结构水平不一的算力会与用户实际需求产生误差,高质量供给资源短缺,用户无法触及,更无法形成情感的共鸣;而低质量的通用算力资源庞大,但是利用率不高,对用户无法形成科学有效的实质性帮助,阻碍情感交流,造成低端供给资源的浪费。简言之,AI、ChatGPT 等高端供给技术算力资源短缺,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存在断层,加上 AI 生态、服务等资源的短缺,使得数字中心的算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失灵。

三、全新场域: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动态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②这深刻表明,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的驱动引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将助力生产力的突破变革,形成新的智能生产关系。因此,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努力做好数字布局工作,创新要素供给、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促进传统产业转型,为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开辟新天地。

(一) 筑牢基底:强化创新要素供给,夯实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数据底座

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据资源要素的支撑。数据搜索引擎供给资源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现有的中心化存储模式显示,数据仍然是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新兴资源。网络日常生活提供原始数据就是生产行为本身,不同数据结构会产生不一样的传播效果。在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加入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能够进一步创新数据生成要素,规训数据价值意识,为数据发展提供可靠平台。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要做好意识形态指导工作,强化数据意识,夯实意识形态数据底座,方能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动力支撑。

高质量发展与数据库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制约 AI、ChatGPT 大模型建构的痛点,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健全科技规划和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共享数据库,聚焦不同区域现有公共数据资源,建立面向智能化发展的数据联盟,方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②《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①因此，要不断改革完善数据授权机制，推动典型数据的创新转化，盘活数据存量资产，提升数据精准化水平。持续强化数据创新要素供给质量，开发视频、文本、图像等新型数据采集功能，培育优质数据，有效解决舆论噪音缺陷难题。新质生产力的高端数据共建能够进一步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绿色环保提供数据源泉，夯实意识形态思想传播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②这深刻表明，创新数据生产要素供给，需要摆脱人类社会生产的物理局限困境，培育创新环境，运用算法、ChatGPT 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为生产注入数字动能，融入共建共享意识形态思想内容，对数据进行无形的意识形态指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③这深刻表明，要突破旧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束缚就要不断健全意识形态数字体制机制，才能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保障，提升供给效率，形成科学有效生产机制，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实现智能生产方式创造社会财富目标。从数据生产端入手提高质量供给水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等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融入数据生产过程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从被动供给到专业供给、主动供给、高效供给水平的跃升。优化劳动力、能源、物流等初级供给要素，以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为结构单元融入供给要素中，实现意识形态思想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科技、资本、人才素质等高端供给要素是进一步强化高质量产业循环发展的关键。因此，在提升高端供给要素过程中，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着力协调不同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使之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性力量的同时能够为中国舆论发声。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需要的各种数据积累，要素集聚效应在此过程中将更加凸显。依托“东数西算”数据建设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大集群创新基础设施，强化关键数据创新开源，实现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共享，为产业集群汇聚数据力量。与此同时，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创新源头，发挥产业基础或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数据共同研发、升级和扩散，形成集群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集群的创新转型。产业集群通过创新数据源向新产品和新模式快速转化，不断孕育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从而在未来竞争中掌握发展主动权，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简言之，在庞大的信息源流中筛选具有时代意义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其中，使之成为代表国家舆论宣传的数据库，在共建共享中实现数据赋能目标。

（二）提质增效：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提升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算法效率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的新跃迁，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过程中提升算法效率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双赢目标的根本。坚持以科技研发、智力创新为动力，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最大限度集聚各类科技创新资源，以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为引领启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意识形态数字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不断融合各种创新资源提升算法效率，为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时代贡献。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④，要始终把创新作为各领域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为意识形态数字发展开辟新领域。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2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06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加大源头性技术储备,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在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指引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涵盖新产业的各个领域,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①,为产业发展汇聚创新力量。创新力量的赋予需要意识形态数字提升算法效率,在 AI 和 ML 模型建造中公开数字运行机制,在初级数据筛选中革除以市场经济效益为先的偏见数据,允许更多数据的入围以确保模型算法运行的科学性。在算法模型运行中,归并排序是提升算法效率的有效途径,具体做法是将数组分为两个子数组,对每个子数组递归排序,然后将两个有序的子数组进行合并。这不仅能够使算法效率得到稳步提升,还能为收到的搜索舆论引擎问题进行由大化小、由小化无的排序,提升算法效率。在此基础上,通过大型数据库增强算法神经模型,对于文化、舆论传播内容多次检索到的数据做好相应标记,通过二叉堆进行整合排序,提升数据的参数效率。数字技术基础的升级能够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革新。意识形态内嵌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之中,与特定用户主体的内心思想和现实需要相通。所以意识形态数字要创新整合主流意识形态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②,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使用排序算法进行资源优化整合,方能应对不同数据思想文化诉求,为特定用户提供思想指导,为智能社会的前进发展贡献数智力量。马克思指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③这深刻表明,科学只是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部分,人的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④这深刻表明,作为提升文化创新资源的必备工作,科技人才的培养成为促进生产力变革发展的关键,是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对于算法技术运行高端伦理难题,运行算法无法及时辨认分析,此时高新技术人才的参与能够打破僵局,为算法运行注入人才动能,强化质量效率。这深刻表明,新质人才的培养对提升算法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根本就是要弘扬科学家精神,抓住创新型科技人才,尊重科学家、企业家主体地位,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优秀人才资源,有效提升算法效率。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找好定位目标,对经济、金融、算法等领域的顶尖人才进行价值塑造,激活人的创造精神和创新基因,建立健全适合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提升创新型人才的自主思考能力,为科技创新发展节省研发时间,进而在优质人才资源基础上打赢提升算率攻坚战。

（三）换轨升级: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增强意识形态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算力支撑

传统产业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不断形成战略新兴产业。数字、信息技术、互联网作为新兴产业,须立足传统产业所承担的基本物质活动,不断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创新文化建设,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发展,方能展现出高质量发展产业竞争力。同时,传统产业需要吸纳科技创新成果,将数字技术、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融入产业发展中,在算力支撑下为新兴产业技术提供多维运用场景。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传统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优质化发展空间。意识形态数字拥有承载思想价值的优势,这也意味着它同样承担着被思想价值规训的责任。传统产业是以传统生产力为主,意识形态数字的赋能为传统产业融入主流价值规训和新兴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模糊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界限区别,为二者的协同发展赋能数字力量。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融合互补效果愈发明显,赋予产业更多的新兴元素与内涵,结合当前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思想上层建筑,融入促进美好生活元素,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生活产品和服务,增加人们幸福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与意识形态传播需求相匹配的智慧服务综合体系,”^①立足不同产业差异化需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不断破除制约科技创新活力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健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创新算力供给模式,在数字算力支持下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同时提高意识形态数字化生产效率。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的形成与提升农业数字化生产力水平相结合,打造“党媒算法”助力农业生产、销售物流等高质量供给平台,对传统制造业做好算法转型工作,加快研发数字商务技术,赋能商贸、交融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服务员的思想和技术水平。其一,发挥算力对传统产业的驱动作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数字力量、融入科学家精神,不断规训传统产业思想价值,提升算力供给效率,增强支撑产业体系先进性能力。作为智能时代的新兴生产力,算力不仅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现实力量,也为数据创新活力的释放保驾护航,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贡献了新型社会化发展模式。其二,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动资源高效率循环利用,在算力容量中融入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于意识形态传播中触动人们内心绿色发展基因,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为绿色发展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②这深刻表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是互为融通的,绿色算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绿色创新技术的形成与发展对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加快发展数字技术,提升算力容量,创新算力供给模式,事关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问题,事关智媒传播舆论阵地问题,事关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③这深刻表明,面对算力供需断层问题,要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或低端供给,提高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此同时,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做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将未来美好生活场景融入算力场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点燃人们对美好未来向往的精神火把,满足人们的个性化精神需求,是算力赋能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彰显。因此,在算力支撑下推进 AI+ 赋能意识形态数字传播技术的深入发展,引导传统舆论信息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不断延长产业补给链,补齐产业短板,深刻把握新型舆论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明晰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路径。

四、结 语

智能时代,意识形态数字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支撑,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变革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极力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数

①陈坤、李韵琦:《数字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要素构成与提升路径》,《理论探讨》2024年第2期。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据新型生产要素、智能生产力的参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新兴产业数据的赋能,两者融合发展为社会带来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其深度融合越位困局难题也日益凸显。意识形态数字虽然能够运用科学数据、算法、算力为新质生产力寻找新的赋能资源,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变革,但是数据共享理念滞后、算法运行能力不足、算力供给模式陈旧等问题也时常伴随左右。因此,目前最优路径是深入把握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健全意识形态数字创新体制机制,为数字发展提供科学平台,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强化创新要素供给、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促进传统产业转型,才能更好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意识形态数字的深度融合。

(责任编辑:陈 雪)

Ideological Digitalization: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YAN Wu'er, HUANG Guoxiong

Abstrac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 theory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emerging as a key driver of social progress in the new era.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se forces is closely tied to the enabling power of ideological digitalization. By leveraging ideological digitalization, we can explore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uncover practical demands, and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o-development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a new ideological framework to guide the advance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ing a leading edge in modernization. While ideological digitalization offers vital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on and growth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onceptual resistance,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supply-demand mismatches.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in the digital age,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enhan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upgrade existing system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t is crucial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ideologically-informed digital innovation that can sustain and fuel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ideological digitalization;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

About the authors: YAN Wu'er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HUANG Guoxiong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